

月儿不语,在天空保持着沉默。小河无声,在大地恪守着沉默。月光和波光交相辉映,昭示出沉默的美丽,美丽的沉默……

不知是谁给这条小河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金沟河!美好而意蕴深远,浪漫而富有诗意。小河朝沐晨曦,暮融晚霞,日日夜夜静静地流着。河水清澈碧亮,宛如一条彩带缓缓伸展向远方。远方在期待着什么?我没有忘记,10 年前金沟河畔建起了一所干休所,安置了一批军队离退休老干部。当时在解放军总医院急诊科担任副主任医师的朱德元帅的孙女朱新华主动要求到干休所工作。她业务全面而且有抢救经验,已有 20 年临床经历,是负责干休所老干部医疗保健的合适人选。作为医院行政机关的领导,我对她要求到干休所很不理解。总医院急诊科抢救任务重,是医院一个重要窗口,也是造就医学人才的前沿,大有用武之地,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干休所门诊这个小小的天地,怎能与之相比?

后来朱新华告诉我,她铭记着朱德爷爷、康克清奶奶的教诲,做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她愿意为老干部服务,觉得很光荣。我明白了她的初衷,感受到了红军精神在革命后代身上的内在传承。

朱新华来到金沟河干休所门诊扑下身子,一干就是十几年。许多人早已把她遗忘,她也似乎遗忘了外面的世界。

早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和军旅作家宗仁、军报资深记者聂中林来到金沟河干休所,想采访这位出身帅门又甘愿寂寞的军人。

久别重逢,当穿着一身绿军装的朱新华出现在我面前时,依然是那么英姿俊朗,散发着军人特有的气质。齐耳的短发显得干练利索,长睫毛下闪动着坦诚聪慧的眼神,从她身上分明看到当年红军女战士康克清的影子。

她得知我这些年“退而不休”,潜心于文学书法,一见面就向我索要书法作品。我欣然答应了。在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干休所所长崔京滨、政委王小班向我们介绍情况。

准确地讲,这所干休所是无法想像的军队巨大的“人才库”。所里的离退休老干部,绝大多数是在全军最大的医学殿堂——解放军总医院工作了几十年的医学专家。一代宗师、医学泰斗姜泗长,心脏病专家苏鸿熙、黄宛,脑外科专家赵国升,医疗保健专家牟善初、赵东海,放射科专家高育墩,妇产科专家叶惠方等等,这些军内外乃至世界著名的医学专家都在这里安身休养。有趣的是,干休所有若干对夫妻,双方都是专家教授,汤洪川和王孟薇,张国华和顾俾云,田牛和罗毅,高育墩和曹丹庆,赵东海和徐玉华等等。如今,这些

老干部老专家已是雪染双鬓,平均年龄 79.8 岁,其中 80 岁以上的 68 人,90 岁以上的 7 人。虽然他们年逾古稀,但渊博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于一身,其价值无法估量,被视为“国宝”。说这所干休所“遍地是金”,一点也不过分。

朱新华的服务对象正是这样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医学专家。所长崔京滨、政委王小班无激动地说:“去年,干休所党委被评为总医院先进党委,干休所被评为总后勤部先进干休所。其中一个过硬的条件,是我们所的医疗保健工作做得好,老干部老专家非常满意。这在全军干休所中是很难做到的。我们一方面靠的是医院这棵大树,另一方面靠的是朱新华。她不仅周到细致地为老干部老专家服务,而且坚持原则,大家都很佩服。朱新华身为元帅的后代

大美无声

——记朱老总孙女朱新华

乔秀清



朱新华(前一)与干休所领导在研究工作

却不争官,出身名门却不计名利,能享受特权却不要照顾,已跻身医学殿堂却主动要求到干休所门诊,这样的人打着灯笼也难找!朱新华是干休所党委委员,那是党员们民主选举上来的,她晋升技术 5 级,那是我们给她跑来的,凡涉及到名利的事,她从来不肯领导开口。”

听到所长、政委的夸奖,朱新华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她已习惯于沉默。沉默是金,大爱无言,大美无声。

第二次去金沟河干休所采访,是个雪后初霁的日子。我没有忘记承诺,特地给朱新华写了一幅草书长卷,是李清婉的一首词: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星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意在祝她在事业上“风鹏正举”,扬帆远航。她会意地笑了,笑容像月光一样皎洁。

我与作家王宗仁一起走进朱新华的办公室。朱新华负责的干休所门诊共有 8 位医护人员,他们实行网格化管理,将 150 余名老干部、老专家和遗属一一登记上网,分组服务。像鸟儿熟悉蓝天白云,像鱼儿熟悉碧

海清波,朱新华对每位老干部的身体状况了如指掌。朱新华递给我一张统计表:肿瘤病 19 人,高血压肾功能不全 4 人,患 5 种疾病以上 61 人,生活不能自理 4 人,不能参加活动的 19 人。根据老干部的身体状况,朱新华定期登门巡诊。她是干休所每一家的常客。朱新华拉开办公室的抽屉,取出一本《干休所工作人员与老干部联系登记簿》,说:“这是我的巡诊记录,其中不少老干部你认识。”

我仔细翻阅着朱新华的巡诊记录,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跃入眼帘。“你认识老红军杨磊吗?她是已故总医院蒲院长的夫人。”朱新华问。

“我认识她,老人家很热情开朗,我和她多次聊天。”

“如今她 89 岁了,在金沟河干休所休养。我每周到她家去一趟,老人家心里话都对我说,

每次都取出水果招待我,把我看成自己的孩子。”

如果您凭想像以为朱新华居住的是爷爷奶奶留下的住宅,那就大错特错了。干休所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小家,她爱这片蓝天,这片土地,她觉得自己是一粒沙,紧紧地贴在大

地的胸膛。

干休所环境优美,楼房排列整齐,甬道宽阔,花木扶疏,芳草铺地。生活设施配套,新修建的院门庄气派,惹人注目。所内的文化广场、门球场、健身园是老干部老专家休闲娱乐之地。在这里,有时也能听到朱新华开心的笑声。夜晚,干休所楼群的灯光与金沟河的波光辉映闪烁,楼群很静,小河无声。在这座喧嚣的城市很难寻到这么安静的地方。金沟河上空那一轮明月朗朗地照着楼群、河水,一切都沉浸在溶溶的月色里。

朱新华有时陪伴老干部老专家到金沟河边散步、聊天、赏月。这里的月色很美,月初,月牙儿悄然出现在金沟河边的树梢,那弯弯的月儿仿佛是开启天堂的钥匙。中秋,月亮像一位俊俏的姑娘,静静地对着金沟河照镜子,梳妆完毕便去亲吻夜空的星星。朱新华不正是一轮明月吗?甘于寂寞,把皎洁的月华洒满天空和大地。

2005 年 8 月的一天,干休所组织老干部参观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当晚 9 点,副军职离休干部陆训、沈友竹夫妇正在家里看电视。突然,陆训感觉头痛,接着呕吐。朱新华接到门

诊值班员呼叫,迅速赶来。她立即联系神经内科专家罗毅前来会诊。经检查,陆训血压低,有病理反射,可能脑内有问题。朱新华当机立断,将陆训送到总医院神经外科诊治,确诊为脑内出血,第二天便成功地做了手术,使陆训转危为安。

在采访中,我们谈到黄宛教授:“听说他给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看过病。”“是的。他也给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我爷爷朱德看过病。应该说,他是我国心电图的开山祖师。如今,他已是 90 岁高龄了,他和夫人身体都欠佳,走路不行了,两人出门都坐轮椅。”朱新华说。

几年前,干休所老专家高育墩两次到总医院口腔科看病,都没挂上号。口腔科得知这个情况,觉得对老干部老专家照顾不周,特地向高育墩教授赔礼道歉。事后,朱新华做了专门调查,发现干休所不少老干部老专家牙齿有毛病,因出行不便没去医院治疗。黄宛教授经常牙痛,这位出门坐轮椅的老专家只好忍着。朱新华向干休所领导反映了这个

问题,并一起研究,给总医院领导写了专题报告,建议在干休所增设口腔门诊。这个建议很快得到批准,房间、设备、医生全部到位,干休所口腔门诊正式开业。朱新华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黄宛教授,并亲自推着轮椅陪同黄宛教授来到口腔门诊修补牙齿。黄教授的牙痛病治好了,他对朱新华非常感激。朱新华对他说:“几十年来,您诊治并挽救了成千上万名心脏病患者,我爷爷还找您看过病呢,为您服务是应该的。”这真挚朴实的话语,掷地有声。老教授的眼睛湿润了,他望着朱老总的孙女身着绿色军衣的身姿,仿佛是井冈山亭亭玉立的一株翠竹。

朱新华是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着爱心。一桩桩一件件似乎平凡的小事,使我心灵发生了强烈的震撼。她是春天的一朵小花,不与群芳争奇斗艳;是夏天的一滴雨珠,滋润着祖国大地;她是秋天的一支芦笛,奏出和谐的乐曲;是冬天的一片雪花,映现出人间的圣洁。

采访结束,朱新华赠送我一本《朱德诗词集》,这是一件珍贵的礼物。书中跳动着一颗伟大的心脏,铸造成一个坚定的信念,展现出一部壮丽的历史画卷,汇成了气势磅礴、震天动地的涛声。朱新华也是一本书,是爷爷奶奶教她写成的蕴藏着大爱大美的无字之书。

初春的傍晚,我在干休所徜徉,任温柔的晚风轻轻吹拂,陶醉于多年来未曾感受过的迷人月色。皓月当空,月华如练,浩浩银河,群星闪耀。每一颗星,都是天宇感激月亮的眼泪。此时此刻,朱新华正走在巡诊的路上,她用匆忙的脚步丈量着夜的长度,夜幕下,楼群的每一扇窗户都映着一个小小月亮。

月亮沉默不语,却那么美丽。

电话里,文洁若先生的声音,少女般清脆、甜润。

在北京木樨地一座居民楼里拜访她时,眼前这位出生于 1927 年的八旬老人,与电话里那个声音,一时让我难以划上等号。

她面容慈祥,皮肤白皙,仪态端庄,平易近人。昨天在电话里,她要我们和她一起参加译林出版社在京召开的一个会议。今天,她特意仔细地着了淡妆,换上一袭蓝底银花的套裙,戴上了项链。临出门前,她对着镜子,梳理了一下蓬松卷曲的头发,又低头将胸饰调正,那是一朵素雅的紫色小花。

我与妻子微笑着看她做这一切。这时,她想到,出席会议的,还有几位老朋友,她想带几本近年出版的《生机无限》。她问我:“我想带几本书,你怕不怕沉?”我说“不怕”,她转身引我们走进书房。

书房不大,也有些乱,书及杂物挤得人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陈旧的老式家具,淹没在一摞一摞书籍之中。另一间屋,也是书房,同样,书一堆一堆从地板擦至高处。书架上有些灰尘,像是许久没人住,其实是她忙,顾不上收拾。

四面墙上,见缝插针挂满照片,彩色的或黑白的。从中,我看到了年轻的萧乾,拥着小孙女的她,泛舟湖上的她与萧乾……有些是老照片,已经泛黄。

1954 年,她嫁给了离过三次婚的作家萧乾。萧乾比她年长 17 岁。当时,萧乾请她看了一出话剧。当剧中人说出“我们 40 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时,萧乾捏了一下她的手,小声说:“我 40 年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我找到家啦!”然而,这段美好的日子,只延续了 1000 天。

婚后第三年,萧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农场劳动。她对萧乾说:“叫下去就下去。我等你一辈子。”她一个人带着 3 个孩子,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艰难地支撑起一个家。

在那特殊历史时期,萧乾不堪批斗之辱,多次自杀。因为有文洁若,他又坚定了活下来的信心。言及往事,她说:“那时,我就是一只老母鸡,把萧乾和孩子们保护在翅膀下。”

1990 年,年过八旬的萧乾和 60 多岁的文洁若开始翻译西方文学现代派“天书”《尤利西斯》。4 年后,这部巨著被译林出版社隆重推出,旋即在国内文学界引起轰动。

萧乾的晚年时光,是文洁若人生中又一段美好日子。她说:“可惜太短了。”

1998 年,萧乾先生离世后,文洁若一个人平静地生活。儿女们在美国,想请她去。她说在国内习惯了,到国外不适应。

这之后的 10 年,她也没有请保姆。因为她一个人生活,简单,“一辈子都靠自己,老了我也不想麻烦别人”。平时,她很少下楼,在家读书、写作,整理与萧乾有关的资料。“我从小生活在宗教家庭,自从嫁给萧乾后,他就成了我的宗教。”指着墙上照片,她说。

来拜访她,我与妻子为她买了些糕点。现在要出门了,她提醒我们别忘了带走。“嗨,你给我这一堆东西,我一个老太太,得吃多少天哪!?”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还好,她把糕点拎到厨房去了。走回来时,她说:“我收下了,谢谢你们!”下楼时,她说:“你们年轻人用钱的地方多,下次来,千万别给我花这个钱啦!”

到楼下,我建议说:“咱们坐出

租车过去吧。”她坚定地摇摇头,“不花那个钱,咱们坐地铁。”

看我想再说什么,她笑着补充道:“我喜欢坐地铁。”

往地铁站走,她脚步飞快,我与妻子跟在她后面紧追。下台阶进站时,她慢下来,手抓扶手,一步步往下走。我伸出手,想搀扶她,但被她拒绝了。她笑着说:“今天你能扶我,明天谁扶我?还是让我自己来。”

地铁车厢,拥挤不堪,有人起身给她让座。她表示感谢,却不想坐。让座的人也不好意思坐,我劝她“还是坐下吧,人家一片心啊”。她点点头,坐下,抬起头说:“其实,我更喜欢站着。站着有益身体。再说,我不老,身体棒着呢。”

这是 2006 年的事。那一年,她 80 岁。也许有一天,在北京地铁里,你遇到一位朴素端庄、喜欢微笑、不喜欢坐着的老妇人,她,可能就是文洁若。

出地铁后,到会议地点还有一

文洁若先生二三事

马明博



段距离,因手提的那包书有些沉,我再次建议坐出租车。她说:“不坐车,我们走,年轻人运动太少更应该多走。”

这让我想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来北京时,在西单图书大厦,初次见到她时的情景。当时,我对她说:“我是运动型的老太太,每周要步行 20 公里。今天早晨,我从木樨地步行到建国门,到社科院听大江讲座;午饭后,又从建国门走到西单,我慢慢走,一点都不累。一位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讲过,人衰老首先从腿开始,如果一个人每周坚持步行 20 公里,他就不容易衰老。”

此刻,我只好从命。

会议后,译林社所请的在京数十位文化名流一起用餐。我与妻子忝陪末座。餐毕,众人握手寒暄,即将告别。此时,她大声喊来餐厅服务员,指着桌上剩菜说:“姑娘,把这些剩下的饭菜打包,我要带走。”赠送的果盘里,余有数颗葡萄粒,服务员没有打包,她微笑着说:“还有这个,也请一起打包。”在文化名流愕

然的目光中,数桌剩菜剩饭,被打成两个大包。

我在一旁看着,有些难为情。没想到,她开始喊我:“你别在那边站着啦,快过来帮我提啊。”我走过去,低声问:“这样好吗?”她坦然相对:“这有什么不好?吃了总比浪费了好啊。”曾经有一本书,把她列为“最后的贵族”。近距离地观察,我发现,她哪里是挥金如土的贵族,她是一位和蔼可亲、惜福爱物、过平常日子的邻家奶奶。她想,她也是,她是真正的贵族,因为她有一颗高贵的心。

会议主办方派车送她回家,在路上,我向她求证一件事。

那是我读到的一则故事。在公交车上,有乘客往地上吐了口痰。她见后,走过去,把自己手中的信封撕了一半给他:“你没有纸,我给你,以后不要往地上吐了。”该乘客面有愠色,对她说:“我都活 50 多岁了,还没见过你这样的!”某一站,该乘客下车了,售票员对她说:“这样的事,我们不敢管。”到家拿出信封,她才发现,信封里原本装着两张电影票,此时只剩下半截了。

她想了想说:“好像有这么回事。人对事,要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我一直按着萧乾先生说的做着。看到不文明的事,我就想管一管。”

对于人情世故,她好像浑然不知。想请她写幅字,作个纪念。她爽快地答应下来,又提醒我:“你自己得记着不断地提醒我啊,我从小就爱忘事。”

据我所知,关于萧乾先生的事,她一件也没忘。所以,当时,我呵呵一笑。之后,也不愿为写字的事打扰她。

后来,听说她身体不好到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我打电话过去问候,她爽朗地说:“谢谢惦记。放心吧,我啊,先死不了,还有许多事没做完呢。比如,我还欠你一幅字呢。”

写至此,忽然想到一本名叫《水知道答案》的书。

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博士研究发现,对水说不同的话,其结晶截然不同。听到“爱”“感谢”的水,结晶呈现出美丽的六角形;听到“笨蛋”“讨厌”的水,几乎不能形成结晶。江本胜博士由此感慨道“每一滴水都有一颗心”。

人体 70%是水。喊别人的名字,其实也是一种形式的对水说话。身体里的水感受到这些文字(名字)的信息,应有所感应。

文、洁、若,这三个字,含着什么样的信息呢?

文,本意指动物美丽的皮毛;如今演变为文雅、文化等。

洁,本意指干净,没有染污,没有杂质;引申为“操行清白,品德高尚”。

若,甲骨文字形,是一个女人跪着用双手梳理头发,表示“顺从”,可引申为“柔顺”。到今天,“若”字已演变为“如同,好像”的意思。“若”字,是中性的,它像一面镜子,不偏,不倚,客观,独立。

文、洁、若,这三个字,不仅组成一个名字,还对应着一个人,更包含着某些祈愿与祝福。被称作“文洁若”的这个入,她的行动、言语、意识所流露的,又恰恰是“文雅”“干净”“柔顺”。

写下上面的文字时,我感觉,“文、洁、若”这三个字,与我所认识的谢海若先生是相称的。

谢门所谓“本地风光”,就是指人或事物本来的样子。

文洁若先生的“本地风光”,也正是文雅、干净、柔顺。

今年 6 月 13 日,是我国著名作家柳青逝世 31 周年。回想起曾经与他的一段交往,不禁使我感慨万端,他的时刻关心普通群众的悲悯情怀,更使人深受启迪。

上世纪 60 年代初,我在当时的坪头大公社工作。一天上午,街上的新华书店里不少人争购小说《创业史》,我也买了一部。手不释卷地熬了一个通宵,天亮前将全书粗读了一遍。书中讲的是农村的事,说的是农民的心里话,对于我这个农村工作的干部来说,甚为亲切。从此,《创业史》就成了我的贴身读物,不论是下乡还是驻队,常常带在身边,一有空闲就谈几页。柳青的名字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他成为我十分敬仰的大文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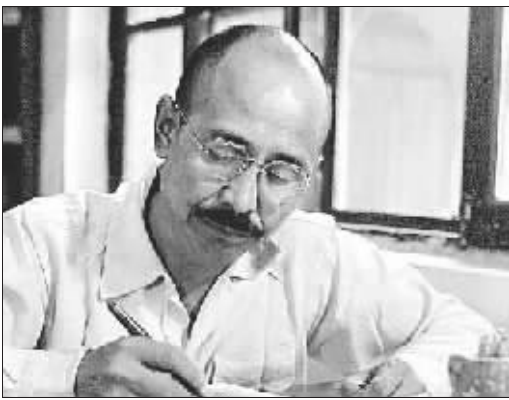
真是无巧不成书。在长安社教(上世纪 60 年代初全国范围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期间,分团决定让我担任皇甫公社工作队副队长,并处理日常工作。一天上午,工作队正在开会,有位同志进来,一位社员要见工作队的领导,队长便让我出去接待一下。我走出会议室,看见这位社员身材不高,上身穿黑布对襟夹袄,腿上穿浅蓝色裤子,脚上是一双黑面白

底的半新旧布鞋,朴素,但很整洁。头上戴一顶旧的遮阳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椭圆形白色眼镜,眼镜后边是一双炯炯有神但有些怒色的眼睛,嘴角上留着很像贺龙元帅的小胡子,看上去不是一般农民。我主动招呼,请他进宿舍办一个房子坐下,并倒了一杯水。他静静地坐着,既不喝水,也不说话,两眼只是直盯着我。当时,我有些不知所措,就问:“你是?……”我的话还未说完,他即操着浓重的陕北口音说:“我是长安县委挂职的柳青。”一听这话,我赶忙站起来,上前紧紧握住了他的双手,很激动、崇敬地说:“哎呀,往常只看您的小说,想不到今日见到您了,真巧!”柳青的脸上由阴转晴,问道:“你看我的什么小说?”我笑着说:“长篇小说《创业史》、短篇小说《一窝猪娃》等。”他说:“哦!你是我作品的读者了!”就这样,我们俩人有说有笑地聊了起来,真觉得心心相印,一见如故。

原来,柳青那时虽然在中共长安县委任副书记,全家却住在皇甫公社罗湾大队。为了便于接近群众,利于创作,他和妻子马谝的组织关系都转到了罗湾大队党支部。社教中要进行党员重新登记,负责

记忆里的柳青

王 霖



这项工作的同志找不到他的党员档案材料,就登门去质问了。这位同志不但不听柳青的解释,还发脾气训人。我听了哈哈大笑说:“革命革到从边区来的老党员、老革命、老前辈头上!”随后,我立即给办公室打了招呼,陪柳青回家。还去罗湾大队工作组组长的住处,把负责党员登记的两位(都是北京

人民大学的同志)找来,说明了柳青的情况,并与他们一同去柳青的家里道了歉,消除了误会。

后来我得知,自从柳青一家住进罗湾大队,他不仅主动参加党支部的活动,更是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中,经常走村串户,访贫问苦,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他对全大队几十户人家的基本情况都很熟悉,谁家有几口人,几男几女,分几辈,大人、小孩的名字叫啥都能说得上来。谁家缺劳力,老人多,又有病人,生活有困难,他就让人马谝给送些吃的,送些看病的钱。为了方便群众就医,他把《创业史》的全部稿费拿出来修了一所医院。逢年过节,还

在家里招待大伙儿,和大家拉家常。群众都说:“柳书记一家是咱农民的好朋友,贴心人。”

记得那年春节过后不久,柳青邀我去他家里做客。他说去年秋季收成不好,现在社员普遍缺粮,有的户已经往饭里掺树叶了。他建议利用吃午饭的时间,不打招呼去几家看看。我们便来到村子东头的第一家。这家正在做饭,熬的是包谷糝(带皮)和一棵树叶。到第二家时,工作组的两位同志和主人正在吃饭。树起碗吃了一口,也是包谷糝和树叶,很粗,很苦,难以下咽。恰巧,当时的西安市委书记张国声来检查工作,我就如实汇报了情况,特别说明这是柳青同志发现的。这件事得到了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没过几天,长安县便给农村拨了一批返销粮,解决了广大社员的生活困难。

柳青不仅十分关心群众,党性

原则也非常鲜明。他和我一起学、探讨社教文件,领会中央关于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精神,强调干部还是要一看、二帮、三教育。他不仅这样说,更是身体力行,帮助我们认真做好干部正面教育的工作。这样,就有效地防止和克服了执行政策中的片面化和绝对化倾向。我们有柳青作参谋,工作不仅比较活跃,还出了许多经验,在社教简报和报刊上作了介绍。社教工作结束,工作队(组)离村时,群众在村口热烈欢送,有的干部、社员还把我们一直送到了火车站,洒泪而别。

作为一名作家,柳青的风趣和幽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常约我去他家里闲聊,我也非常乐意听他谈话,那真是一种艺术享受。他用陕北腔说话,有时就唱,配合着举手投足,学各种人物的动作、表情,把大家惹得前仰后合,笑得一个不停。听别人谈话,柳青十分认真,像是要把一字一句全都存入自己的记忆里似的。从这里,我也看到了他观察人物、观察生活的独到之处。

社教试点结束第二年的夏收以后,我因公出差到西安,还专门去罗湾大队看望了柳青一家。那时

他刚从兰州躲花粉过敏哮喘病回来。一见面我们都很高兴。他们夫妻俩介绍了社教以后农村的情况,柳青还谈了他的私生活。他从书柜里拿出一张照片,指给我说:“这是我原来的老婆,离婚后一直在北京工作。去京开会,有时还去看一看。”马大姐插话说:“常去看哩!”惹得我们都笑了。他还给我看了《日本、朝鲜、阿尔巴尼亚等版本的《创业史》。那次我们一直畅谈到了凌晨两点钟,谁知这却成了我同柳青的最后一次见面。

“文革”中,柳青一家的遭遇不时传到我的耳朵里,灾祸发生在他们家里,却疼在我的心上。后来打听到柳青从农村搬到了西安市西大街的一幢居民楼里,我专程前去看望。楼是筒子楼,他家住二层,楼道里没有灯,黑乎乎的,按房号敲门,却把邻居叫出来了。这位老娘告诉我,他来这里没几天,就因病住院了。住哪儿不知道。后来虽然又找过一次,也未见到人。再后来,便是从报纸上知道了柳青逝世的新闻,我当时悲痛得泪流不止。直到现在,我仍为我们国家过早地失去了这样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惋惜,也为自己失掉了这样一位挚友而痛惜不已。